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传奇

艾德·康威

布雷顿森林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闭门密战

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伦敦，2014年，863页，29.95美元（精装）。

本书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作者生动地刻画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山中一家偏僻饭店入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与会者。在晴好的夏日，饭店里一派丰饶，还有数不清的美酒，这对经历了近五年战争的与会者们来说是久违的景象。本书中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来自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虽才华横溢，但个性古怪，当时他的健康状况欠佳，这大大影响了他的权威，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是妻子莉迪亚·洛普科娃（Lydia Lopokova），她曾经是非传统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以及来自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国际经济学家，依靠自己的奋斗白手起家，他精力旺盛，干劲十足，还曾与前苏联情报局打过交道。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达成一致的、国际货币制度，这个制度应能消除经济局势的不稳定和大规模失业带来的祸患。尽管论题复杂，起草会议一片混乱，他们仍然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至今仍然是国际合作的代名词。虽然凯恩斯对这一结果表示失望，怀特也对部分主要功能提出了质疑，但无论如何，这一结果创造并资助了两个机构，70年来这两个机构一直将自身植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心位置。



本书作者是天空新闻台的经济学编辑艾德·康威（Ed Conway）。他以热情生动的文笔为我们再现了这个伟大的故事。本书参考了各位与会者的回忆录，并从世界各地档案馆搜集了引人入胜的趣事。若本书侧重布雷顿森林会议中人物的戏剧性事件，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存亡攸关的重大问题的背景情况，以及这些问题对与会者的重大意义和协议的后续进展状况。

康威突出了谈判代表所承受的压力，分别来自别有用心国内政治家，他们对会议涉及的问题尚未完全掌握，以及处心积虑想要独占赚钱方法的金融部门。后来两份协议得到批准，由此创建了IMF和世界银行，鉴于其他机构（如国际贸易组织）的命运，这一结果似乎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讨论的主要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问题在今天的政策制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财政盈余和财政赤字国家是否应该共同承担调整的重担？确保汇率稳定的同时不会导致制度过于死板，也不会带来无法承受的调整负担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国内经济政策应享有多大的自主权，资本流动应享有何等程度的自由？如何管理一个国家难以继之的巨额债务？康威对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饭店中与与会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进行了生动的叙述，为当前危机中的问题提供了敏锐深刻的见解。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谈判达成

的协议条款中对IMF使命的表述非常复杂，晦涩难懂。考虑到混乱的谈判局面，这并不令人意外。凯恩斯抱怨美国的协议草案看起来像是用彻罗基语书写的，但怀特及其代表团却坚持协议维持原样。他们在法律传统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其基本文本可理解为让这些条款适用于起草人认知之外的情况。结果就是它为IMF提供了适应及响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需求所需的灵活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设计是模糊的。精明的起草人认识到只有其他国家准备对规则的违反者进行制裁，规则才有可能持续下去——而当违反者是强大的财政盈余国家时，其他国家则几乎不对其进行制裁。如规则制定得更加具体，第一项挑战就足以使协议破裂。实际上，规则的执行情况并不严格，还相应产生了规避不便规则的方法。

布雷顿森林会议设计的货币制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实际执行，1971—1973年逐渐被废除。但这段时期是国际经济史上相对比较繁荣和稳定的一个时期。我们很难弄清楚地将多少功劳归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协议的具体规则，将多少功劳归于其他因素（如，战后恢复，或美国的需求冲动及其提供所需流动性的意愿），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和金融市场迅速增长的压力破坏了这项制度，国际货币制度的潜在改革者仍在继续呼吁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如果国际货币制度规则的持续如此短暂，那么在新罕布什尔州这几周中实现的主要成就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以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和经济发展为使命的两个机构的创建和出资。它们在推动共同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已经验证了凯恩斯、怀特及其同行70年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设想和决策。

马克·艾伦
(Mark Allen)

前任中欧及东欧高级区域常驻代表、
前任IMF政策、发展与检查部主任



IMF 内部探究

里亚克特·艾哈迈德
金钱与严厉的爱

IMF 纪行

Visual Editions, 伦敦, 2014年, 208页,
 40.00美元(平装)。

在《金钱与严厉的爱》一书中，里亚克特·艾哈迈德(Liaquat Ahamed)描述了IMF经济学家及其国际团队的职业生涯，同时也讲述了该组织的成立与发展简史。要了解这些幕后信息并非易事，因为IMF工作的敏感性使得该组织非常谨慎。

本书通过分析IMF基层员工的日常活动和文化，使该组织及其工作任务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艾哈迈德并没有对整日泡在棋盘数据表中的政策专家的工作夸大其辞，他只是交待了IMF的工作人员是如何默

默地为重要全球公共商品的创造贡献着力量。

在揭开这个座落在华盛顿19大街上的神秘机构的面纱时，艾哈迈德避开对金融危机的压抑的纪实性叙述和对高级管理层谄媚奉承的描述。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幸运地避免了人为的再现型对话和那种为身经百战的英雄所做的回忆录式的虚假的无所不知。与其说他的书是《压力测试》(Stress Test)的再现，不如说该书是宏观经济领域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

艾哈迈德曾多次访问IMF总部并于2012年年末参与了其员工的工作行程，他的课题非常具有时效性。2007年，认为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的各方认为IMF已经落后于时代，将它视为一个毫无作用的机构，但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IMF再次返回世界舞台的中心。自那以后，在IMF成立70周年这一年，它几乎每天都能登上新闻头条。

曝光度的增加并未能增进人们对IMF工作的理解。而艾哈迈德的著作有助于弥补这一差距。

这本专著以IMF活动的四个方面为中心：华盛顿总部的日常生活；2012年10月在东京举办的IMF——世界银行年度会议的强大影响力；2012年10月的爱尔兰“任务”，或者说是员工访问，爱尔兰是近年来从IMF借贷的少数“发达”经济体之一；2012年11月的莫桑比克任务，莫桑比克是IMF连续借贷国，是严重依靠援助的贫困国家。这些事件为艾哈迈德提供了一个平

学习以求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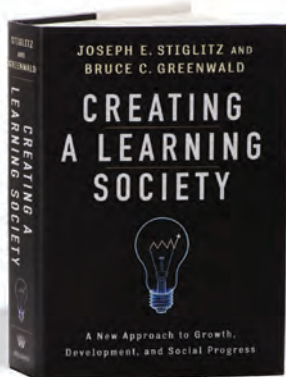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布鲁斯·C. 格林沃尔德

创建学习型社会

经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途径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 2014年,
 680页, 34.95美元(精装)。



他们靠近并扩大了这一边界，虽然有人会认为在企业和经济依靠学习实现增长的世界中，边界的限定存在着弊端。本书最起码以全新的视角阐述了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和福利中的作用。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缺少政府的干预将会出现知识供应不足的局面。然而，政府干预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大量的知识，这一点尚不明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认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点——垄断产生创新——并非在任何环境下都是正确的，不过他们承认其对立观点——竞争对于创新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也有道理，但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承担固定创新成本的能力较弱。本书为激励国内企业创新和学习并将知识保留在国内的产业政

成功与不成功经济体的标准是能让企业、部门及最终整个经济实现其真正潜力的学习过程。

学习决定经济成功的观点与文献中的多个观点联系在一起，并对其他观点提出了质疑。对基于生产因素相对优势的标准概念(在资本流动的世界里)是否仍具意义的质疑充实了界限模糊的“动态比较优势”。作者提出，大多数企业都被困在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内；学习让

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最初设想是做成一部纪念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 间接提及鲍勃·索罗[Bob Solow])的演讲集，而最终它将阿罗“边做边学”的经典文章和索罗的经济增长模型相结合。本书提出技术变革是学习的过程，以及企业成长和国家发展是通过三种学习方式——发明、创新(使发明适用于生产过程)和“学习方法的学习”。作者认为，区分

台，详细阐述了IMF员工活动的广泛工作范围及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艾哈迈德既表现了IMF工作的单调乏味，也呈现出只有多数IMF成员才会体会的坚定的使命感，即便在承认这些工作让他感到厌烦时。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IMF的专家们仔细琢磨全球经济细节，因此其他人无需再做这样的工作。

艾哈迈德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讲述

有可能的话，艾哈迈德可以赋予IMF员工更丰富的色彩——单调、一成不变的黑色西装领带以外的色彩。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故事和人物，他们使IMF成为富有质感的工作环境：比如，IMF的桑地诺出纳员在小酒馆中发表他的市场建议；芬兰事务主管酒量奇大，超

越了历任前苏联财政部长；伊朗执行董事声援扩大同性夫妇的婚姻福利，远远早于IMF的其他多数成员国。

艾哈迈德指出IMF员工共代表了150个国家，但除护照上的基本信息外，他似乎并未深入扩展他的多元化观念。众多少数群体生活的改善记录了机构本身的发展进程，并把一些精辟的见解转化为IMF的机构文化，其中不乏一些悲喜交加的故事。

与此同时，艾哈迈德认为IMF员工体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众为一：训练有素、所见略同。但他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他们读相同的研究生院，听同一批教授的课，写相同主题的论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但确实意味着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职业语言，并且对待复杂问题能够深入挖掘。

这种同一性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它不可思议地激发了IMF黑色玻

璃门背后的辩论。一般内部审查会以“基金组织三明治”的形式进行：强调研究论文的精彩文笔；进而不断驳倒所提出的每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观点；最后以对所采用的计量经济技术工具的赞美而结束。IMF与世界银行一类的其他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政策上的血腥争斗都在其办公大楼内进行：一旦争论结束后，员工即结成统一战线面对世人。

这个原则意味着在众多家银行中，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它被简称为“基金”。在《金钱和严厉的爱》一书中，艾哈迈德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讲述了IMF员工如何创造了超越其2500名员工总和的巨大成就。

布雷特·豪斯
(Brett House)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作家、麦吉尔大学珍妮·索韦基金会
高级研究员、
IMF前工作人员

策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但是书中提出的产业政策类型与最近复苏的“挑选赢家”（尤指建立在相对优势基础上的赢家）的实践有很大不同。

这些观点与其他相对复杂的观点均以一种直观、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时，采用简单的模型（在阿罗-索罗惯例中）会让直觉更加敏锐、结论更加清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用于向经济学者（但不一定是专家和读者）展示新的观点的模型。第一部分从学习的重要性开始，描述了企业的学习方式，呈现了市场结构问题，最后是福利及对整个经济的思考。第二部分对更为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包括封闭经济环境下的学习、长期动态，但仍然以直觉和简单模型为基础。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在指导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使用专业工具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如何帮助

社会实现可持续增长。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对于此课题的热忱极具感染力。

但是，第三部分“学习型社会的政策”有些令人失望，部分原因是它缺乏前两部分的严密性和直观性。这部分开始长篇累牍对“华盛顿共识”和全面贸易自由化的批判。无论这是不是偷换概念，这些评论没有从作者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中揭示出任何政策影响。本书的前两部分为政府干预高级远程学习提供了可靠的理由。难点在于如何对这些干预方式进行设计，其干预方式不会出现以往干预尝试中出现的各种政府失灵（如上世纪90年代前非洲误入歧途的产业政策）。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在他们简短的政治经济章节中提到了这个难题，但并未提供任何指导性意见（除了一句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视国情而定”）。然而，这正是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被出于好意但最终具有

破坏性的政策建议所累的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问题。这也是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在他最初演讲的讨论者评价中提出的难题，在演讲中，他提问产业政策的论点是否是比强大的政治经济反论点更“有力度”，并最终提出理性建议：“先试行，并在确保实际证明政策无效时能够停止干预”。

这本书非常强大，写得很精彩。对于本书政策章节的失望并不是一种批评。更确切地说，它是对后续著作的邀请，一本正面应对学习型社会的政策设计和实施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的著作。”

尚塔亚纳恩·德瓦拉贾
(Shantayanan Devarajan)
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
首席经济学家